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美〕库尔特·勒布 编
托马斯·盖尔·穆尔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美〕 库尔特·勒布 编
托马斯·盖尔·穆尔

吴珠华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美)施蒂格勒著;勒布和穆尔编;
吴珠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6990-8

I. 施… II. ①施…②勒…③吴…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9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美〕库尔特·勒布 编
托马斯·盖尔·穆尔
吴珠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990-8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³/₄

定价:37.0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4 年已先后分十辑印行名著 40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一辑。到 2010 年底出版至 46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 年 10 月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1986年为纪念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诞辰75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一部论文精粹。

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11年1月17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郊的伦顿。他最初在西雅图市接受教育,大学毕业后赴芝加哥继续其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并于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20世纪30年代起,施蒂格勒博士曾先后执教于美国的依阿华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布朗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曾赴欧洲从事过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工作。1958年,他又回到芝加哥大学,任Charles R. Walgreen 功勋经济学教授,此后一直在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成为新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与此同时,施蒂格勒教授还曾长期担任美全国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屡次应邀出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学者,并曾任该研究所国内经济研究项目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64年,施蒂格勒博士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成为该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主席。从1977年起,他又担任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和政府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的主任。1982年秋,施蒂格勒博士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其毕生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

施蒂格勒博士一生著述颇丰,从1940年出版其第一本著作开始,便不断地有重要著作问世。他的著作所涉及的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也十分广阔,均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无论是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还是政治经济学或信息经济学等方面的著作,都曾在美国引起过广泛的影响。如他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就曾数次再版,并且至今仍是全美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生所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尤其是施蒂格勒博士在工业组织、市场功能以及政府管制的理由和效用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更是使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98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施蒂格勒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报中曾经这样概括过他的主要贡献:

“通过长期、广泛的实证性研究,乔治·施蒂格勒博士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这一研究的一部分,他对经济法规如何影响市场进行了探索。他对产生经济法规的诸力量的分析,已开辟了一个经济研究的全新领域。

“施蒂格勒博士的成就已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应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他的独特的研究成果,还使他被公认为‘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以及边缘学科——法律和经济学的先驱之一。”

经哈佛大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这部论文精粹,可以说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施蒂格勒教授一生的辉煌学术成就和他对经济科学的独特贡献。该书所收入的重要论文,既有较早期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以及反映他在上述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等研究领域之杰出成就的“论寡头垄断”、“经济管制理论”,也有从经济思想史的

角度讨论西方经济学家的作用和伦理思想基础等问题的“经济学抑或伦理学”等重要文章。除此以外,该书还收入了几篇表现施蒂格勒博士之锐敏思想和机智谈吐的杂论,使我们在了解这位杰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伟大贡献和辉煌成就之余,还能领略其犀利幽默的文采。正如托马斯·盖尔·穆尔博士(Dr. Thomas Gale Moore,里根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为这部论文集所写的导言中所说的,读这些文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乐趣”。

为能顺利地翻译并出版此论文集,译者从1993年起便开始着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在与胡佛研究所出版社总编,以及施蒂格勒教授的研究助手和家属等美方有关人士进行接洽的过程中,得知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已于其时不久前逝世,不禁深感遗憾,同时更感到应当竭尽全力译好这部著作,以使广大的中国读者能够从中比较全面地了解施蒂格勒博士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主要贡献和杰出成就,并且或多或少地获得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更深认识和启迪。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为加强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注重实证性研究的治学方法。

我坚定地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认真地读一读本书所收入的这些论文,肯定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大有益处。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谢实同志曾协助做了部分工作,谨在此声明并表示感谢。

译者

1996年6月于北京

序

这部论文集是为纪念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和学者之一，乔治·J. 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诞辰 75 周年而出版的。虽然他的同事们早在 20 年前就推选他担任了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从而使他跻身于该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荣任此职者之列，但是，他在经济学界的成就与地位直到 1982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才算获得应得的承认。当听到他获奖的消息时，我想，肯定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认为：“理所当然”，“他早该获此殊荣”。

我第一次拜读施蒂格勒的著作是 40 年前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时，他对复杂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刻分析与明晰地阐述自己思想的能力，以及文章中随处可见的敏锐措辞，当时便使我印象颇深，现在仍然如此。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曾称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我想，要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像施蒂格勒这样写作，那经济学就不会被冠以如此称号了。

此后一百多年来，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当中，没有人比施蒂格勒更能令经济学不再沉闷，也没有人比他更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作为经济学家，他极力主张改变以前那种缺乏实证依据的推理方式和思想方法，强调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均需经过实际

的验证。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重视实际经验的科学家。施蒂格勒具有利用严谨的实证方法来检验某些很有权威的理论与否的特殊才能。在此我仅举一例便可证明他的这种天赋，他曾对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有利于消费者，提出质疑，结果这类“真理”未能经受住他的严格检验。他的著作，以及他给予学生的影响，使经济管制的有利效用之说已不再是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义。相反，今天新崛起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都以怀疑和嘲弄的态度看待政府管制的效用。

当未来一代经济学者回顾过去 10 年这场横扫美国经济界的巨大反管制浪潮时，一定会认识到乔治·施蒂格勒对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的深远影响。在他之前的经济学界，几乎没人会想到撰写“保卫管制”(In Defense of Regulation)一类文章，而现在这类文章却越来越常见，然而其作者们——坚持主张施行管制的顽固分子——正在逐渐成为经济学界被围困的少数派。像哥白尼(Copernicus)一样，施蒂格勒推翻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探索真理的方式。

本书汇集了从乔治·施蒂格勒的大量天才著述当中精选出来的一些作品。在此我们想对库尔特·勒布(Kurt R. Leube)以及托马斯·盖尔·穆尔(Thomas Gale Moore)参与此书所收论文的挑选及编辑工作表示感谢，并对穆尔博士在担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百忙当中抽出时间为本书撰写富于启发性的导言，表示感谢。

尤其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施蒂格勒教授与胡佛研究所持续 15 年之久的密切联系。他不仅曾屡次担任我所的客座学者，而且还

从 1972 年起,开始担任我所国内经济研究项目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任此职期间,他对几百名申请到我所从事一年经济分析及公共政策研究的年轻学者进行了能力审查和评估,并以不同寻常的热情使这些后辈经济学家因他的中肯评价而受益匪浅。在此,我仅代表全所同仁,向施蒂格勒教授祝贺生日,同时希望他今后能与我们保持更长时间的积极合作关系。

胡佛研究所所长

格伦·坎贝尔

致 谢

胡佛研究所出版这部论文集是为庆祝乔治·J. 施蒂格勒教授75周年诞辰，此意始于1985年夏的一次编辑部讨论会上。要想从这位学者如此广博的著述当中选出一些精品是一件很难做好的事，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值得收入的论文，但是，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所有入选论文均得到了施蒂格勒本人的充分赞同。在此，我们想对他为出版此书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是在胡佛研究所及其所长格伦·坎贝尔、第一副所长约翰·科根(John Cogan)以及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赫森(Robert Hessen)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

在此，我们还要对胡佛研究所出版社的全体优秀工作人员，以及奥德丽·卡尔森(Audrey Carlson)和格兰·普伦(Glen Pullen)在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一切帮助，表示感谢。

乔治·J.施蒂格勒生平简介

库尔特·勒布

I

乔治·J.施蒂格勒 1911 年 1 月 17 日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郊的伦顿,其父母均为 19 世纪末来自欧洲中部的移民。作为约瑟夫(Joseph)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的独子,他成长的环境较少拘束。

施蒂格勒在西雅图开始其学校教育,1931 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获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由于缺乏适当的指导”,他的大学教育主要选择的是应用商业管理课程和政治科学课程。后来,他前往芝加哥在西北大学拿到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该校学习期间,施蒂格勒师从善于激发学生兴趣的经济学家科尔曼·伍德伯里(Coleman Woodbury),增强了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决心。1933 年,施蒂格勒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不仅因为有像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以及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这样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学者而光彩照

人,而且还拥有一批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其中包括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和萨恩·卡尔森(Sune Carlson)],更为其增添了辉煌。这段求学的日子,对施蒂格勒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艾伦·沃利斯(W. Allen Wallis)持续终生的友谊(此二人后来与施蒂格勒一起,被称为现代芝加哥学派的“三个火枪手”),就是在 50 年代的芝加哥校园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活跃的学术气氛对施蒂格勒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

施蒂格勒于 193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其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博士论文是在学术水平很高的弗兰克·H. 奈特指导下完成的。虽然他曾开玩笑地说自己绝不能再从头至尾地看一遍这篇文章,因为这会使他很不好意思,但是,此论文还是在 1940 年成功地作为他的第一部著作得以出版发行。^①

II

施蒂格勒于 1936 年在阿米斯(Ames)的衣阿华州立学院经济系开始其教书生涯,当时的系主任是 T. W. 舒尔茨(T. W. Shultz)。同年 12 月,他与芝大同学玛格丽特·L. 麦克(Margaret L. Mack)结婚,他们婚后生有三子:斯蒂芬(Stephen),统计学家;戴维(David),律师;以及约瑟夫(Joseph),社会工作者。玛格丽特·施蒂格勒已于 1970 年夏去世。

施蒂格勒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发表于 1937 年的政治经济学杂

志,题目是“卡尔·门格勒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arl Menger)。该文论及了主观奥地利学派从方法论出发的自由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与施蒂格勒所主张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实证方法有所区别。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两年后,弗雷德里克·加弗(Frederic Carver)邀请施蒂格勒去明尼苏达大学与弗朗西斯·博迪(Francis Boddy)以及阿瑟·马杰特(Arthur Marget)一起在该校任教。1938年,他应邀赴明尼苏达大学。然而,战争使学术活动的开展遭到普遍的制约。1942年,施蒂格勒获准休假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前往纽约,到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工作。此后他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经济产出、就业以及生产率发展趋势之定量研究的论文。而且,这段时期与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杰弗里·穆尔(Geoffrey Moore)以及老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共同探讨,使施蒂格勒更加确信实证经验对检验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②

虽然从1942年到1976年,施蒂格勒一直是NBER的研究人员,但是他曾在二战时期离开该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统计研究小组成员。在那里,他与弗里德曼及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一起,在W. 艾伦·沃利斯领导下从事一些军事问题的统计学分析工作。1945年,战争结束前不久,施蒂格勒返回明尼苏达大学,并很快在那里与弗里德曼会合。同年,他发表了“生存的成本”(The Cost of Subsistence),这是一篇早期的论线性规划的文章。

施蒂格勒在1938年时就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了大量有关微观经济理论的论文,但是,他对价格理论的富于开拓性的实证性研

究工作,直到1946年《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一书的出版^③,才真正达到了顶峰。他还在1946年与弗里德曼合写了《屋顶或者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在这本书中,施蒂格勒有力地论证了对租金的控制必然会导致房屋租赁市场的扭曲,从而实际上会造成居住空间的不当配置。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问世便激怒了自由主义者,并从此成为经济学家的必读书目。在另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1946]中,施蒂格勒继续就最低工资立法对资源的配置、总需求、家庭收入以及贫困的有害影响进行了分析。^④

施蒂格勒于1946年到布朗大学任教,而弗里德曼也于同一年离开明尼苏达前往芝加哥大学加盟芝加哥学派,因此他们在明尼苏达大学的重聚没能持续很长时间。

III

在布朗大学只做了一年全职教授之后,施蒂格勒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教了11年经济理论、产业组织以及经济思想史。他的新同事中包括A. F. 伯恩斯(A. F. Burns)、A. 哈特(A. Hart)以及拉格纳·诺斯科(Ragnar Nurske)。1947年,施蒂格勒发表了两部在全国经济研究所时便开始创作的专题著作,《美国的家仆》(*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United State*)和《产出与就业的发展趋势》(*Trend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⑤在第二本书中,他首次使用了全部要素生产率衡量方法,即将产出当作所有投入的指数。

同年,施蒂格勒应 F. A. 冯·哈耶克(F. A. Von Hayek)之邀前往瑞士的维维伊(Vevey)附近,与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拥护自由市场的学者们共同出席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这一小批见解相同但以往却缺乏沟通的思想家们聚在一起,探讨用以保卫自由社会的恰当方法和手段,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蒙特·佩拉任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作为该组织的发起者之一,施蒂格勒后来曾于 1976—1978 年担任其主席一职。正是在该学会这第一次会议期间,他认识了艾伦·迪瑞克特(Aaron Director),并与之建立起亲密友谊。迪瑞克特在产业组织和公共管制理论方面对施蒂格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年后(1970 年),施蒂格勒在其论文“关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迪瑞克特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中描述了这位友人的一些思想。

1948 年施蒂格勒应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在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这段期间,他发表了一些有关产业组织的研究论文;重新修订了《价格理论》一书;还发表了论文“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1951]。在这篇文章中,施蒂格勒表明了劳动分工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这一论点。^⑥

1955 年,施蒂格勒被授予古根海姆研究基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在瑞士日内瓦工作了 5 个月。随后他发表了其重要论文“完全竞争,历史的反思”[(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1957],以及精心研究的成果“伯纳德·肖、西德尼·韦伯以及费边社会主义理论”[(Bernard Shaw, Sidney Webb, and the Theory of Fabian Socialism) 1959](这两篇文章均

收入本论文集)。施蒂格勒有关“生存技术”的观点,即用以确定某一产业的企业效率和最佳规模的方法,也是在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他在其著名的“规模经济”[(The Economies of Scale) 1958]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篇有争议的论文是在 NBER 完成的,但是最终却未能收入该所出版的丛书。

IV

施蒂格勒于 1958 年回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 Charles R. Walgreen 功勋经济学教授,并从而得以在其最兴盛时期加盟新芝加哥学派。从那时起,强调推行货币主义和消减政府作用,明确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因而对经济学与政治学产生了极深刻影响的芝加哥学派,便成为施蒂格勒余生之学术活动的家园。

在回到芝大的当年,施蒂格勒便发表了其力作(虽然有点遭到忽视)“经济政策的目标”[(The Goals of Economic Policy) 1958],出于对政府政策的极度不信任,他对许多由政府强制施行的管制法令之价值提出质疑。从 50 年代末以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已经显示出他在公共管制方面的研究之逐渐增长的兴趣。^⑦

60 年代初,施蒂格勒开始对政府管制的经济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发表的文章是他与克莱尔·弗里德兰 (Claire Friedland) 合写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管制者能管制什么?”[(What Can Regulators Regulate?) 1960]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考察了受管制的和未受管制的公用事业公司所收电费的费率,从而得出了管制对价格不存在有意义的作用这一结论。在继此文之后陆